唐甄的政治思想

陈 哲 夫

唐甄其人

我国明末清初之际，是被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腐朽的明王朝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到这时候来了一个总暴发，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群众怒吼起来了，组成了几十支武装起义队伍，杀官吏，攻城池，劫财物，分土地，百万大军纵横驰骋几万里，烽火硝烟二十年，把个明王朝打得落花流水，灰飞烟灭，末代皇帝朱由检也被迫自杀身死。社会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用统治阶级的话来说，叫做“自明季闯贼煽乱，衣冠（指地主）之祸深，而豪民（指农民）之气横，……贫儿陡成富室，奴隶远冒宗华。”（《长治县志》）。随着社会关系的这种深刻变化，在思想界也放出了光辉夺目的异彩。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冲破思想禁区，不再仅仅是围绕着孔孟之徒所给指定的框框去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而是在更根本更实际的问题上去观察国家的命运，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始了新的篇章。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思想界的名星，但是就政治思想来说，名气比他们稍为逊色的唐甄，则不愧为他们之中的魁首。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别号圃亭，四川省达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死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政论家。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清顺治十四年的举人，曾在山西省长子县担任过十个月的知县，因与上司的意见不合被革除职务。之后，不断遭受新的打击，“再辱於燕，阨於滑、卫、汝、淝之间。如是者二十余年，卒无所得食。”（《潜书·独乐》，以下引自《潜书》者，只注篇名）随着政治上的失意，唐甄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由于田薄赋重，他把土地变卖了经商。经商失败后而去为牙（按：“牙”是货物买卖的中间人）。这样，他就由官僚大地主家庭下降为普通地主，由普通地主而经商为牙，及至经商而“尽亡其资”，为牙“客无至者，产失而行废”的时候，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穷愁潦倒落魄的文人了。晚年，他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半饥半寒的清苦生活。

唐甄是一个关心政治、并对政治有独特见解的人，因而遭到时俗的冷遇。他曾经十分感慨地说：“甄，下士也，貌朴而言讷，人皆易之，以为窒焉而不知天下之务者也。学非今学，言非今言，人皆略之而不与之言。”（《潜存》）“学非今学，言非今言”，正是说明他的政治见解与众不同。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潜书》九十七篇，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

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地走向没落时期，这种专政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明末清初

的进步思想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君主专制进行抨击和批评。唐甄是他们当中最勇猛的一个。

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唐甄首先反对神化皇帝，指出皇帝是人不是神。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就是这种制度的象征，维护皇帝的尊严、神化皇帝就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一种手段。那时候，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被视为无所不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异物，是不同于人类的"天子"和"龙种"，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谁如果敢稍持异议，不但会被人指控为大逆不道，立招杀身之祸，就是自己在内心里也总觉得是亵渎了神灵，惶惶不安。分明是愚昧禁锢了头脑，反而感到是维护了真理。可以说，皇帝的无上权威和专制制度的枷锁，就是靠人们的愚昧来维持的。一旦人民觉悟起来了，皇权和专制也就接近末日了。唐甄就是抹掉皇帝脸上圣光，启发人们心窍的先驱者之一。一反御用学者的胡言乱语，唐甄大胆地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善游》)"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亦人也。"(《抑尊》)把皇帝从"天帝大神"的尊位拉回人间并和老百姓等同起来，这就打击了所谓"天子"、"龙种"的神话，动摇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拨去了笼罩在人们眼上的云雾，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极为激进的思想。

唐甄不仅把皇帝放到普通人的地位上，而且还对他们的罪恶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抨击。他尖锐地指出："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他从两个方面揭露了皇帝的罪恶。第一，他认为，历史上的帝王们为了夺取皇帝的宝座和掠取社会的财富，常常无故杀人，是有罪的。他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同上》)他痛斥了刘邦屠城阳、屠咸阳，刘秀屠城三百的罪行，愤怒地说："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同上)第二，他认为，历史上的帝王们都是一些只顾自己享乐而不管人民死活的人，他们凭借人民的力量，爬上了最高的统治地位，聚拢了全国的财富，当为他们流血牺牲的群众的尸骨还没有收敛的时候，就忙着筹备登极大典了，穷奢极欲地去享受了。他愤怒地写道："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於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眥未乾，於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同上》)显然，唐甄的抨击是有些偏激的。对于历史人物(包括皇帝在内)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具体人物作具体的分析，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不应该采取一概骂倒的办法去对待复杂的历史人物。把一切皇帝都说成是贼，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其论述也有片面的地方，如把一切祸乱只归咎于皇帝一个人。实际地说，君主专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它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根源。虽则如此，但从根本上说，这种抨击是有进步意义的。

唐甄鉴于皇帝擅用威福的弊害，提出了"抑尊"的主张，撰写了题为《抑尊》的文章。其所以要"抑尊"，就是因为帝王们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是他们蔽目塞听、胡作非为的根源：第一，由于帝王们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对于他们，只能奉承，不能批评；对于他们的任何命令，只能服从，不能稍持异议，谁只要稍持异议，就会招来杀身灭门之祸。这样的结果，使得君臣关系变成猫鼠关系，大臣见了皇帝，胆战心惊，汗下股栗，皇帝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在他们的周围，颂歌满耳，谀词盈庭，忠语诤言，一句也听不到。他们蔽目塞听，踌躇满志，自以为无所不能，凡事主观武断，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唐甄尖锐地指出："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

照於九渊。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说不能诲，龙逢、比干不能谏，而国亡矣。”(《抑尊》)第二，由于皇帝们过分的尊贵地位，使得公卿大臣都无法经常接近他们，于是皇帝身边的一些侍卫、仆隶们，便乘机窃弄权柄，狐假虎威，颠倒是非，欺上蒙下，臣民看到的只是侍卫仆隶们的命令，根本听不到皇帝的声音，皇帝们听到的只是近侍们的禀报，根本无法了解臣民的隐情，上下隔绝的结果，便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对于这种由于地位尊贵造成的上下隔绝的情况，唐甄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他写道：“蜀人之事神也必冯巫，谓巫为端公：禳则为福，诅则为殃。人不知神所视听，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货财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于人，人不接于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权臣嬖侍，其犹端公乎！无闻无见，大权下移。诛及伯夷，赏及盗跖，海内怨叛，寇及寝门，宴然不知，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同上)“势尊自蔽”，这是唐甄对于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唐甄警告帝王们说：“是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可不惧哉，可不戒哉！”(《任相》)

唐甄还进一步提出了“抑尊”的办法。他认为，“抑尊”首先就要提高公卿大臣们的地位，使他们有权力对皇帝和其他权贵们开展斗争，“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这种攻击不但能使“百官有司”害怕，而且首先能使皇帝害怕，“畏之自天子始。”(《抑尊》)其次，帝王们要自觉地贬抑自己的身分，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要向普通的老百姓学习。他们应该认识到不但不应该欺负公卿大臣，就是“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但应该向地位较高的师、傅求教，就是地位比较低下的“郎官博士”也可以求教；不但应该向知识渊博的圣人贤人访问治国理民的大计，也应该向“闾里父兄”这种普通黎民寻访经国安邦的道理。唐甄并把这一思想理论化，概括为“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同上)这就是说，要做群众的上司，必须先做群众的部属，要做十个人的上司，必须虚心向十个人求教，要做百人的上司，必须虚心向一百个人求教，要做天下人的皇帝，必须虚心向天下人求教。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光辉的。再其次，他还要求帝王们，在衣食住方面，不要特殊化，要向老百姓看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尚治》)上述这些“抑尊”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所作的揭露和批判，是对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有力控诉，他“抑尊”的主张是对未来的新社会的憧憬。尽管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美丽的理想也不过是空中的彩虹，但是它却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料在社会上流传下去，为后来的进步思想家们所吸收，帮助他们砸开思想禁区，探索走向新社会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甄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鉴于帝王们所处的重要地位，唐甄提出了他们的表率模范作用问题。他认为，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贤明还是昏庸和作风正派与否，同国家的治乱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皇帝个人贤能，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就是臣民的才能一般，国家也能治理好；反之，国家就要发生动乱。一个皇帝即使仅仅有普通人十分之一的错误，就要发生比普通人千百倍严重的恶果。所以，一个有远见、明智的皇帝，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唐甄写道：“人无贤不贤，贤不贤惟君，政无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虽恒才恒法，可以为治；君惟无道，虽有大贤良法，亦以成乱。是故明哲之君，无所为恃，必责于己。知天子於民庶，

过及十一，祸倍百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远谏》）由此，他认为，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应该事事都给人民做出表率来。这个表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皇帝作好事，以身作则地提倡一种好风气，全国人民都会跟着做好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皇帝作坏事，全国人民也就会跟着加倍地做坏事，因而形成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他举例说，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提倡俭朴，并且以身作则，用粗布作衬衣，在他的朴素作风的影响下，甚至社会风尚比较奢侈的苏州地方，也因此而俭朴起来。所以，凡事只要皇帝做出表率来，大小官吏，以至广大百姓，就能竞相效尤，蔚然成风。唐甄写道：“昔者明太祖衷褐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锦绣；器可瓦，何必全玉；粱肉可饱，何必熊之蹯，玉田之禾。吾闻明之兴也，吴之民不食粱肉，闾阎无文彩，女至笄而不饰，市不居异货，宴宾者不兼味，室无高垣，茅舍邻比。吴俗尚奢，何朴若是？盖布衣之风也。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人君能俭，则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按：疑为“用三”）余一；於是民不知取，国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钱如土壤，而天下大治。”（《富民》）当然，今天我们无法证明朱元璋是否真的曾经那样俭朴过，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那样深远的影响，但是唐甄所提出的皇帝要事事给全国人民作表率的思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鼓吹民为邦本

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必然要引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唐甄在抨击君主的同时，强调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早就有人提出过“民惟邦本”和“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积极的，但在封建制度开始兴起，王权正在逐步加强的时候，这种观点没有也不可能受到重视，在理论上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随着封建制度日益走向崩溃，唐甄继承了这一进步思想，并以愤愤不平的姿态为民请命。他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衣食住的承担者，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和恩人。离开了人民，便没有国家，也就无所谓政治。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个恩人，不但不去报答，反而压迫他们，只知道对皇帝歌功颂德，把民却忘得干干净净。他愤然地写道：“设为说之之言曰：‘君（按：君即你）之贵，非君（按：指皇帝）赐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于民力乎？’必曰：‘然。’‘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壶餐，必有以酬之；而况受人富贵，且以遗子孙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禄之时，官之衣食，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柘政》）他斥责当时的统治者，“为政者多，知政者寡”，只知道忙于弄军队，理财务，立法度，订赏罚，而却不知道民是四政的基础，因而也不知道爱民，这样下去，没有不亡国的。他说：“政在兵，则见以为（按：“见以为”意思是见识只停留在）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之何见政不见民也！”（《明鉴》）

从“民惟邦本”这一根本认识出发，唐甄认为帝王君主们只有爱民才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一个国家，不管疆土有多大，甲兵有多少，城池有多高多深，山河有多险多固，如果不爱民，便无法强盛。他写道：“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义无道于民，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

为辛，推之如蹶弱童也。”（《远谏》）如果帝王和官吏们，把他们的精力用到关心人民上，必然会出现太平盛世，“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欲不治得乎！诚能以是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风俗必厚，讼狱必空，灾祲必消，麟凤必至。”（《考功》）

从“民惟邦本”这一根本思想出发，唐甄提出了具体的爱民主张。所谓爱民，决不应该是只停留在抽象的议论上，而必须有具体的实际的内容。他认为要爱民必须要保民、富民和关心人民的生活。

唐甄之所以提出保民问题，是因为在反动的封建统治下，达官贵人和贪官污吏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广大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唐甄十分尖锐地揭露了清王朝吏治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他指出，许多“王公之家”，在生活上穷奢极欲，“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穫，犹食之而不甘”（《大命》），“一裘之裘，值二三百金”（《富民》），其恶风所至，造成“四海之内，日益穷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的局面，广大劳动群众，“入其家室，朝则燃无烟，寒则蜎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遍海内矣。”（《存言》）他愤怒地控诉官吏对民的虐取与迫害，远远甚于盗贼的为害，指出：“穴墙而入者（按：指小偷小摸），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按：指强盗），不能夺人之田宅；禦旅于途者（按：指拦路行劫），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按：指农民起义军），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篋而去（按：指小官受更大的官的剥削）。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不是每人都偷），寇不尽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富民》）这种揭发与控诉真可谓淋漓尽致、动人肺腑了。在苛政猛于虎的情况下，广大民众，“常苦生而甘死。”（《权实》）因此，他对那些吮吸民脂民膏的达官贵人和贪官污吏，十分痛恨，称之为“民之仇”，“国之贼”，并提出了“刑先于贵”的主张。唐甄并不主张靠刑罚来治理国家，但是对于贪官污吏，特别是对于包庇贪官污吏的大官，是主张用严刑来制裁的。他指出：“刑不可为治也，而亦有时乎为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同上》）

所谓富民，就是要使老百姓生活富裕。民能丰衣足食，国家就能太平巩固，这是为政的根本。唐甄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存言》）他曾经亲自目击李自成起义军，“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的盛况，禁不住惊呼：“民之归也如是！”他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说，广大农民群众之所以如此望风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群众实在太穷了。在一个穷困的国度里，皇帝必然是众矢之的，万家之仇，而起义造反的队伍，便成为众望所归之处。如果人民群众有一碗饭可以吃，一件衣服可以穿，就不会起来作乱，即使一个中等才能的皇帝也可以统治下去，纵然出现很有才干的起义者，也只能是一筹莫展。他写道：“盖四海穷困之时，君为仇敌，贼为父母矣。四海穷困，未有不亡者。……若四海安乐，人保家室，谁与为乱！虽为君不过中材之主，即有汤武之贤，一匹夫耳，欲谋社稷，亦无如何，况羿、浞之流哉！”（以上见《明鉴》）所以，唐甄所说的富，是老百姓的富，而不是皇帝官吏的富。他明白地表示过，“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困，不可以为国矣。”（《存言》）要做到真正富民，在他看来，除了打击贪官污吏、厉行俭朴外，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他说：“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

鸡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乱，而后风教可施，赏罚可行。”(《宗孟》)又说：“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卿牧》)因此，在他所提出的养民的十八条善政中，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要求“尺土不弃于山，寸壤不弃于谷”(《为政》)，使广大农民，家家“桑肥棉茂，麻苧勃郁”，户户“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达政》)看到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丝绸工商业的发展，他对植桑养蚕，十分重视，曾说：“我欲使桑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教蚕》)他在十个月的长子县令任内，十分注意帮助民众发展生产，“导民蚕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清史列传·唐甄传》)

所谓关心民众生活，就是要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使广大群众能安其居，乐其业。在他所提出的十八条善政中，要求官吏们关心民间疾苦，“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采取有效措施，“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察奸发隐，四境无盗”；注意民众的福利事业，采取措施，使“道路、桥梁、庐舍”得到修治；在“天灾流行，疫疠时作”的时候，民家的疾病能得到治疗。(《达政》)

唐甄认为，是否爱民，是否能具体做到保民、富民和关心民众生活是考核一个官吏优劣的唯一标准。一个官吏不论把自己说得如何廉洁，怎样能干，但是如果不能养民，他的所谓廉洁和才能就得不到承认，不但不应该受赏，而且应当受罚。下面的一段话，把这种思想表达得非常透彻。他说：“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上非是不以行赏，下非是不以效治。后世则不然，举良吏而拔之高位，既显荣而去矣。观其境内，冻饿僵死犹昔也，豕食丐衣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庐舍倾圮犹昔也。彼显荣之举奚为乎？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爱赤子者，必为之择乳母，勤谨不懈，得主母之欢心，可谓良乳母矣；然而无乳以饿其子，是可谓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考功》)

唐甄还严厉驳斥那种把国家的动乱归罪于民众的谬论。他写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哉！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梏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其所以难与言治也。”(《梏政》)他认为民众都是善良的，其所以起来要同官家作对以至造反，是官逼的结果，“虐政亟行，厚敛日加；又遇凶岁，米麦不登，家室罄悬，民无所顾赖”，这就不能不起来“称帅称王，攻城杀吏”了。如果，“茅屋之中有数石粟，数匹布，妇子饱暖，相为娱乐，孰能诱之蹈不测之祸以为奸雄之资哉。”(《厚本》)

唐甄反复地论述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并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保民、富民和关心民众生活的主张，但他没有前进一步作出民权或民主的结论；同时，他笔下的“民”不但包括劳动人民，也包括中小地主和商人。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唐甄“民惟邦本”的思想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从这种思想资料中引出民主民权的结论，将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笔下的“民”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但是，唯其宽泛，各个阶级都可以根据其政治需要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从这个时期以后，“民”的概念，开始更多

地被写进革命者的文告里而成为一个斗争的武器了，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强调为民的功利主义

唐甄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希望有所作为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因此，在政治思想上具有务实际、反空谈的特点。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把批判矛头指向唯心主义理学及其鼻祖程朱之流，认为"程朱讲学而未及为政，……其言政皆可疑也。"(《有为》)

针对唯心主义理学家们"儒者不计功"的说法，唐甄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驳斥，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没有实用目的的活动，便是无意义的活动。他指出："彼树木者，厚壅其根，旦暮灌之，旬候粪之，其不惮勤劳者，为其华之可悦也，为其实之可食也。使树矣不华、华矣不实，奚贵无用之根，不如掘其根而炀之。"(《辨儒》)至于儒者是否计功，他认为，从中国历史上的记载来看，儒者是计功的，它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在《辨儒》一文中，他写道："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则舜不必服有苗，汤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弃不必丰谷，益不必辟原隰，皋陶不必理兵刑，龙不必怀宾客远人，吕望不必奇谋，仲尼不必兴周，子舆不必王齐，荀况不必言兵。是诸圣贤者，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儒后来变了，变成宋明唯心主义理学了，变坏了。他把这种变化用"上党之参"的变化作比喻，认为古之儒"乃昔上党之参也"，是"天下之良药也"，后之儒乃"今之上党之参也"，服用起来已"不能起羸弱之疾"了。他认为"后之儒"的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空谈义理性命，如"造舟行陆，造车行川，无所用之。"(《自明》)

唐甄批判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强调功利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他的"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只是空谈义理，不联系实际；任何一个人，只是坐而论道，不关心民众的生死，是不值得称道的。他写道："儒者不言事功，以为外务。海内之兄弟，死于饥馑，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外暴，死于内残，祸及君父，破灭国家，当是之时，束身锢心，自谓圣贤。世既多难，己安能独贤！"(《良功》)他又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有为》)正是根据这种学以致用、学以救民的观点，他提倡学习军事，研究兵法，他自己也从事战略学的研究。

据此，他评论人物的优劣，并不是根据什么抽象的原则，而是根据一个人对社会是否有什么用处。如果一个人对人类社会没有什么用处，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他说："凡物之生，必有其用，金木土石，人之所资；布帛稻麦，人之所养；奚必珍宝！败屋之瓦，废墙之砾，人之取之则无遗焉。物且有然，而况天下之贤人乎！贤而不致于用，吾见其不瓦砾若也。"(《贡隐》)这种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性命义理的清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提出不平则倾的见解

这里还需要提起的是他的均平天下思想。这方面保留下来的材料虽然不多，但就已知的材料来看，他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应该维持一个"平"字，只有平，才能处理好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使之各得其所。否则，出现了不平，厚薄不一，高低不等，苦乐不均，贫富悬殊，天下就要发生动乱了。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不平现象的出现，都是

以一方损害另一方为条件的，有此处的厚，必有彼处的薄，有这里的高，必有那里的低，有乐者，必有苦者，有富者必有贫者。因此，不平就意味着不安，不平达到一定的限度，就要发生倾覆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唐甄写道："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穫，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麋粥，杂以菱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菲食，不敢自恣，岂所嗜之异于人哉？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大命》)唐甄在这里给反动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警告：社会的不平是客观存在，如何对待这种不平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两种不同的结果。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兢兢业业，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过分不平现象的出现。舜和禹就是这样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们都不是清教徒、苦行僧，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爱好，知道美味爽口，美衣适体，美色娱目，美音悦耳，但他们并不放纵自己的情欲，不去无限制地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他们知道过分的生活上的追求，势必拉大同广大群众的距离，形成严重的不平，导致国破身亡的结局。由于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不平所引起的后果，从而避免了倾覆的悲剧，留下了圣王贤君的美名。然而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侏儒们，一旦黄袍加身，便得意忘形，衣必锦绣，食必膏粱，住必广厦，园囿陂池，遍于国内，妃嫔姬妾，充满后宫。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在自己和广大臣民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贫富不均的畸形发展，在亿万臣民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情况积之已久，必将发生祸乱，"家国一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盗及寝门，左右奔逃，宫妾散亡，珠玉尽俘，宫殿烧焚，身为囚虏，……求为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与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远谏》)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舜、禹其人，即有其人，也不管是否真有其事，唐甄的话则是反映了一种良好的政治愿望，并企图阐明这一历史的经验供帝王借鉴的。

唐甄政治思想产生的条件

唐甄的政治思想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会和一定时代的产物，是对一定时代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所作出的直接反应。当然，这种反应也同他的社会地位、政治经历、学术渊源相关连。现撮要述之于下：

一、对现实社会的敏锐反应。后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在尖锐的矛盾面前，寝食不安，猜忌一切，把全国的军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到朝廷来，特别是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里。在宋朝，一个小小县令的委派都需要皇帝来批准。从一个农民运动领袖转化为皇帝的朱元璋，深知人民力量的可怕，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就千方百计地加强其统治，废除了历来实行的宰相制度，集六部大权于一身。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不辍赐坐、赐茶之举，从容乎便殿之下。"(《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可是到后来，大臣对于皇帝，则"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同上)，"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同上。《明良论四》)，"变色失容，不敢仰视"(《抑尊》)，就是说，皇权发展到了最高峰。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取了政权，为了对付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特务政治。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由明初开始的特务政治大大发展起来。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豢养

着几十万职业特务。这些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除皇帝一人而外，上至朝廷大臣，下至里巷百姓，一言一动，片纸只字，都在被侦察之列，“民间偶语，……辄被杀戮，甚至剥皮、刽舌，所杀不可胜数。”社会上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万马齐瘖，“道路以目”的恐怖气氛。（《明史·魏忠贤传》）高度王权和特务政治的结合，便形成了极权的君主独裁政治。以皇帝为首的一小撮独夫民贼，同全国的广大群众处于极端尖锐的对立地位。历来的反动统治者有一种阴暗的心理，总以为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必须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同时必须对广大民众实行镇压，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甚至说话和思想的权利。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证明：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时候短时期的沉默是为更大的革命风暴准备条件，大的政治经济压迫之后，必然是大的暴动起义，大的思想禁锢之后，必然是大的思想解放，皇权发挥到极处，便走向自我否定，专制到了顶峰，便为民主开辟道路。明王朝极权的个人独裁政治，准备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二十年的农民革命风暴。敏感的思想家们对极权的个人独裁政治作出的直接反应，便是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对王权进行揭发和批判。这种揭发、批判的声音虽然是微弱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唐甄十五岁那年，李自成攻克了北京，朱由检被迫自杀身死。唐甄的故乡四川省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纵横驰骋的地区，唐甄的祖父唐自华和舅父李长祥都曾经是对抗过张献忠农民革命军的地主武装头子。所有这些情况，都不能不使唐甄对当时的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有深刻的印象。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唐甄不喜欢农民起义军，并且在他的著作中咒骂过张献忠。但是，遍于全国的农民起义不能不使他对农民的威力有所认识，如果说他的“民惟邦本”的思想，是从这一巨大事变中吸取的教益，将是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

唐甄晚年，“僦居吴市，仅三数椽，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日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潜书》附录《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贫困的家庭生活，使他悟出了不平则倾的道理。明清社会唯心主义理学的统治，性命义理空谈的流行，使他有的放矢地提出为民的功利主义。

二、思想资料的积累和学术渊源。唐甄是孟轲的崇拜者，写有《尊孟》、《宗孟》的文章，并说：“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存》）孟轲是“民贵君轻”论的首创者。不管人们对“民贵君轻”论作出怎样的解释，而“民贵君轻”论却作为一种思想资料被进步思想家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后世尊孟的人，都是绝对君权的反对者，黄宗羲就是尊孟并反对君主专制的一个。

孟轲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臣关系上，他反对皇帝独尊，反对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反对无条件地服从皇帝的命令，反对对皇帝的逆来顺受，主张君臣的对等关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他称历史上的暴君桀、纣为民贼独夫，认为可以杀，可以逐。在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很激进的。所有这些思想，对于十分关心现实政治、对现实政治非常敏感、而又尊孟的唐甄来说，一拍即合是不言而喻的。

孟轲之后，在晋朝有鲍敬言的《非君论》，在宋末有邓牧的《君道》、《吏道》，比唐甄稍早的黄宗羲有《原君》、《原臣》，这些都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之作。博学多闻的唐甄对这些思想资料应该是熟悉的，也是不谋而合的。

三、新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清之际是中国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新兴起来的市民阶层要求干预政治。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已有很多专文论及，

本文不再赘述。新生产关系的因素，要求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同君主专制制度格格不入；新的市民阶层要求干预政治，首先要求改善自己的政治待遇，受到统治者的尊重和关怀，便以全民代表者的姿态呼吁"民惟邦本"。唐甄经过商，做过牙，对市民的情况是熟悉的，了解他们的思想脉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影响，因而在他的言论和著作中，也必然反映市民的情绪和要求。

《诗经》中有一首诗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们可以借用这两句诗来形容唐甄所处的时代。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由它的后期逐渐地走向没落。一方面是黑夜沉沉，风雨如晦，一幅阴森可怕的景象；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雨交加的浓烟迷雾中，已经隐约地听到寒村的鸡鸣。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虽然还没有倒，但却开始受到了批判；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黎民虽然还在受难，但"人民"这块招牌，已开始闪闪发光。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始了。唐甄和当时的其他一些进步思想家闪烁的思想光辉，正是风雨如晦、漫漫长夜中的鸡鸣。历史如果按照它原来的步伐走下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将不会是那样缓慢，封建主义的桎梏可能提早结束。然而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代替腐朽的明王朝的不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而是落后的满州军事贵族。野蛮的民族压迫，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残忍的文字狱政策，使一度发展的以黄宗羲、唐甄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没有被发扬光大，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又过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把唐、黄等人的进步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上接第 24 页）

的唯一源泉，要使我国生产在扩大规模上高速度发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大量的充足的资金积累。要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增产节约固然重要，但是控制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定条件下，积累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如果后者增长规模小，速度慢，即使在人民生活水平适当有所提高的情况下，积累规模也可扩大，速度也可加快。我们完全可以预计，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 5‰以下，今后二十多年由于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而节约的数以千亿计的消费基金，转用于社会主义积累，将会对我国生产力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大大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只要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尊重人口规律的客观性质，按照人口规律的要求办事，有计划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就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我们从人口发展的"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也一定能够达到。

注：

①③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4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2 页。

④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45 页。

⑤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 3 月 1 日。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 页。

⑦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